

男女同步时代的理论探究

——“妇女学学科建设座谈会”综述

作为有学术意义的妇女研究，在我国不过有两、三年的历史。改革中妇女问题的突出，及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渗入，两者的交互作用，成为妇女学产生的直接推动力。目前我国的妇女研究，主要有两股力量：一是以妇联组织为基地的，主要从事与现实有关的妇女问题研究；一是学术界部分学者从本专业转向，自发地从事妇女的专题研究。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研究超出妇女解放的单线索的范畴，从整个人类文化背景上探讨妇女乃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其趋势实际上是从事妇女学学科的建设。

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一套《妇女研究丛书》。这是一套涉及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性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学和行为科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丛书，作者都是以本学科为基础转向妇女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这套丛书力图为社会中妇女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依据和认识背景，并为建设中国妇女学奠定一定的学科基础。

为了深化丛书的选题，交流各学科及国内外妇女学信息，河南《妇女生活》杂志社和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妇女学学科建设座谈会”。为期5天的会议于1987年7月7日至11日在郑州召开。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有丛书作者和来自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美国和联邦德国的两位女学者闻讯并要求参加了会议。24人作了专题发言。

丛书主编李小江（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介绍了妇女学的学科概念和来历，以及丛书的选题构想。她说，“妇女学”，是本世纪60年代在人类科学综合发展和妇女解放运动背景下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人类在长足进步的基础上，科学地对自身进行反思的结果。妇女是人类的一部分，但由于几千年来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性失落，妇女的历史存在主要是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生物性存在，而人类理性和科学的尺度，也是以男性为中心构筑其框架的。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日益突出的妇女问题冲击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生活。而二次大战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互相融汇的趋势，也促使将人类科学系统化的问题迫在眼前。这时，人们发现，迄今为止的人类科学框架由于女性的被遗漏而并不完整。妇女学的提出和建立，已经势在必行。

“妇女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就象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概念一样，是没有阶级属性的，它不隶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而是人类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诚然，对于妇女的科学抽象和学科化研究的趋势，是西方新女权运动的直接产物，带有鲜明的反抗色彩。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妇女研究已经逐渐摆脱了女权主义的局限，在研究队伍上，也超出了两性的差别，而开始走上了科学研究自律性的轨道。它在传统的学术领地上开辟了许多新的妇女学科，从而打破了传统理论固步自封的坚冰，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新的对象和新的方法。表面上，它是对传统理论结构的挑战，本质上，成为推动人类科学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动力。

我国的妇女研究只是刚刚起步。作为学科意义的妇女研究的进程，与妇女涉及到的学科领域和妇女研究的专业化程度密切相关。目前学术界有关妇女研究只是在3个领域孤立进

行：社会学，史学，文学。尽管“妇女学”的概念在我国提出比较晚，但我们的起点比较高，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走上学科建设的正常轨道。首先我们的社会条件要比西方女权运动时好得多，各界对妇女研究持一种宽容态度；再者我们的研究能较早地完成从自发向自觉的转变，有不少在本学科内有相当基础的学者转向妇女研究；即将出版的《丛书》力图成为妇女学建设的理论基石；郑州大学成立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将为研究者提供信息集散地。

汪琦（天津师范大学）论述了对妇女参政的研究，认为妇女参政有两种含义：一是妇女作为整体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和机会；二是某些妇女在不同层次上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能。

她认为，从纯粹的政治学意义上考察，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母权时代。所谓母系社会中女性即使有高于男性的权威，也只是基于血缘联系的自然权威，不是政治权威。而两者的含义是不同的。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产生了男女的大裂变，它使本来是人类共同的事务一分为二，成为男人的事务（生产，即社会共同事务）和女子的事务（家务，即私人事务），妇女从社会生活中全面退却；同时妇女开始了自身异化过程，一夫一妻制和私有制构成合力，使妇女丧失了独立人格。考察一下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的政治学说中，妇女从来不是“政治动物”，而所谓“个人”也仅仅指的是男人。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女性的官吏、皇帝，但不过是男性政治的空缺中的一种替补，而不是参政。

因而妇女参政意义非同一般，它意味着妇女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标志着人类中男女这两只脚同步时代的到来。同时，我们也找到重新考察政治科学的角度。

从实际政治角度，妇女参政使政治活动范围扩大。传统政治中，国家的作用主要是针对男子所承担的那一部分事务。本世纪以来，由于国际间事务开展，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等，国家职能出现复杂化，向社会生活广泛渗透的趋势。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妇女的参与将原来只属于妇女自身的事务，如生育、儿童教育、妇女保护、家务劳动等，带入到社会生活中，成为国家的职能。从政治学的角度，妇女参政将动摇传统政治学的基础。问题之一，妇女是否有不同于男子的政治观念？问题之二，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大，国家的性质会有哪些变化？问题之三，作为学科群的政治学体系，本身结构又会有哪些改变？等等。

李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女性法律人格的历史与现状问题。通过对历史上男女两性法律人格差异的比较，他指出，现代法律的基本点是平等，妇女解放的目标也是男女平等。什么是平等？平等即是有相同的权利。其内容是享有同等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度，民主是其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形式。很明显，没有自身的独立，不是受制于人，便是依赖于人，是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实现权利的，因此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联系到中国妇女的解放，他认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妇女自身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问题。尽管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平等，但只有妇女意识到自己在法律上应该具有的权利，并为争取和维护这一权利而行动的时候，她才有可能在实际意义上具有完整的法律人格，法律也才可能在实际上赋予她完整的法律人格。

陆中明（湖北省十偃市委党校）从人类学角度阐述了他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殊是与社会发展的特殊相联的。以往对母系社会研究的“活化石”，一是摩尔根考察的北美印第安人，一是中国的纳西族。而这恰恰是历史上的特殊现象，不足以说明历史上的母权现象，也不足以代表人类发展的一般状态。在中国，上古是母权与父权并重，后为父权所取代。与此相联系的是中国有着多种文化起源，形成各“文明点”。这些文明点通过战争联系

和融汇，而战争与男子关系更为密切，因而父权制发展得比较快。其结果成功地避免了停滞在母权时期，把农业文明推向世界的高峰。

以往的社科研究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将现实当作成熟的、稳定的常模，并以此作为中介，向历史和未来延伸。**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把包括现实在内的性的社会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从而提出了在这个问题上新的角度和方法。在谈到性的历史发展的基本理论时，他认为性决不是单一现象，它由3种存在形式组成：生物存在、社会存在、性的心理存在。在此之外，性的发展动力有二：一是生态环境（包括社会环境）作为外部作用力提供了性的发展的可能性、必要性；二是人在历史进化中主动的选择作为内动力，决定了性的状况。这二者再加上三种存在，构成“性”这个对象的全貌。

关于性别问题，潘绥铭的观点是，由于自然科学中“中性人”的存在，可以说人类只是存在三种性别状态。绝对地把人类分成男女两性是文化造成的。人类初始的状况是男女对应的，而传统文化中女性观念的确立，是在女性的性权利和性地位彻底丧失之后。他认为弗洛伊德、波伏娃的性的不平等观点缺乏生物依据，而认为男女的生理、心理是对应的，之所以产生女性在性权利方面的劣势，完全是男性社会文化筛选的结果。此外，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看，心理构成行为，行为也构成心理。女性被动的性心理不是由性构造决定的，而是由长期被动的行为方式形成的。

陶铁柱（《河南年鉴》编辑部）的发言涉及了妇女与经济学的关系。他说，工业社会面临的一个尖锐矛盾是：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使妇女同社会越来越紧密地联为一体；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同社会脱节的问题却日益突出。他认为，只要人类自身再生产活动没有被当作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而以货币形态获得自身的价值，这个矛盾就难以解决。

康正果（西安交通大学）根据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提出按照今人的道德标准将与男女有关的诗词划为“爱情诗”、“色情诗”是不妥当的。他认为，根据古人的理解，应将其分为“风骚型”和“艳情型”两类。所谓风骚型，是以儒家伦理，指向夫妇之情，歌颂的是理想中的完美人格；而艳情型，是由市井流入宫廷的娱乐性诗词，它将女人作为玩赏的对象。

王磊（宝鸡师范学院）的发言批评了旧道德，将女性自身发展权利的被剥夺神圣化，是病态的道德意识。**高小贤**（陕西省妇联）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现代化并不一定理所当然地带来妇女地位的改善。因为一，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个过程，妇女就业只是其中的一步，并不意味着就与男子处于同等的地位；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社会价值尚未被承认，妇女就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会上，在四川外语学院任教的美籍教师**南希**女士和来自联邦德国研究妇女学的**李月滔**女士，分别介绍了她们自己国家妇女状况和妇女运动情况。她们提出，看来每个制度下都有自己的问题。对男女要求的不一致，实际上使男子和妇女都被社会加给我们的性别角色戴上了枷锁。妇女解放应当是全人类的共同解放。另有数位国内的研究者，分题介绍了加拿大、日本、美国等妇女学研究状况，及分学科的研究状况等。

从这次座谈会的内容所展现的范围和深度，可以说中国的妇女学研究已经在理论层次上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并开始谋求在更高学术水平上的国际间的对话。这是极好的势头。但要建立起最终为中国社会所用的本土的妇女学，还要依靠广大研究者对理论和对社会的现状及历史的更精深的探究。

（陶铁柱 谭 深）